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莱蒙湖作证

——中国2004年入世谈判史解密

报告文学

莱蒙湖作证

——中国 15 年入世谈判史解密

雯 子

莱蒙湖作证

——中国 15 年入世谈判史解密

选题策划 杨晓升 作者 雯子*

原刊编者按语：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中国肯百折不回地争取入世，从根本上讲是国内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的抉择，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外交行动，也是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的显著标志和强烈信号。但谁也不曾料到，自中国递交复关申请起，入世谈判由于逐步被“政治化”以及谈判本身的艰巨性、复杂性、特殊性和敏感性，这一谈就是 15 个春秋，用朱镕基总理的话讲，“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

2001 年 11 月 10 日晚，卡塔尔首都多哈。随着

* 雯子，女，原名龚雯，1971 年生，现在人民日报社任职，撰写过大量有关中国入世的文章。本文原载《北京文学》2002 年第 1 期。

一声槌响，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入世法律文件。它意味着历经 15 年的奋争与期待，中国终于被 WTO 所接纳。然而，中国入世谈判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种艰辛？长达 15 年的谈判究竟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交锋，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哪些难以忘怀的场面？多年来一直跟随中国入世谈判的权威记者雯子应约特意为本刊精心采写的这篇史诗式的独家报告，无疑是新年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厚礼——

在瑞士西南部的日内瓦城，横卧着一座清澈如月的湖泊——莱蒙湖，又称日内瓦湖。看上去，此湖面积不大，波澜不惊，与欧洲众多的湖泊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这里却蓄积着醇厚久远的文明底蕴，不断创造着推动人类前进的伟大动力。

千百年来，莱蒙湖始终是智者的天堂。曾几何时，卢梭在湖畔漫步，拜伦在湖上泛舟，斐迪南·德在湖尽头的私宅里构思社会学著作，卡尔·马克思面对水光山色续写他那震古烁今的《资本论》……而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中国与世界则在这儿上演了一场历时 15 年的智者对话和较量。

莱蒙湖的北岸楼舍林立，藏幽纳胜，是联合国欧洲总部和诸多国际组织的所在地。这其中，有一座建筑属于昔日的关贸总协定（GATT）、今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它有两扇不太高大但挺厚重的正门，是用加拿大原木制成。一些人说门很好

推，一些人却说门很难推，关键在于开关的诀窍。近 15 年，莱蒙湖见证了一群执著的中国人在用力叩击这两扇门。有一天，在又一次的碰撞与磨合中，门被不知不觉地推开了——

通过中国入世决定的那个晚上，龙永图破天荒系了一条鲜艳的红色领带。他是幸运的，因为能够梦想成真的官员并不多。

2001 年 11 月 10 日晚，卡塔尔首都多哈。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当地时间 18 点 36 分，在多哈最豪华的喜来登饭店萨尔瓦大厅，随着一声槌响，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入世法律文件。它意味着历经 15 年的奋争与期待，中国终于被 WTO 所接纳！

此刻，在与多哈有 5 个小时之差的中国，很多普通人并未守候在电视机前，而是像往常一样进入梦乡。毕竟，入世不同于申奥，没有那最后一秒的扣人心弦，没有谜底解开后的畅饮放歌，全世界无非在接受一个早就知道的结果，只是，这结果因为包含了太多的感慨而显得有些沉重。

夜里零点左右，给北京的报社发完稿，我乘车返回距喜来登几公里之遥的莫文匹克饭店，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的大部分成员都住在这家饭店。月色下的海湾宁静如旧，西亚特有的燥热已随夜风消散，路旁的华灯折射着这座石油之都的

光芒。作为中国入世“一槌定音”的现场见证人之一，我逐渐从持续了一晚的职业亢奋中醒过来。

回到房间，犹豫良久，我拨通了喜来登的总机，请对方转接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房间：“对不起，龙部长，打扰了，祝贺您！”

“有什么好祝贺的，哎呀，你真是，都几点了？”电话那头传来他疲倦的声音。

“今天对您、对中国都是个特别的日子，真心地恭喜您。刚才在会场我注意到您破例系了一条鲜艳的红色领带，恐怕这不是个巧合吧？”与龙认识近10年，他一向偏爱素色。“嗯，它确实代表我的心情。谢谢你！”龙的语气恢复了常态。

在当晚那历史性的瞬间，身为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灵魂人物的龙永图静静地坐在萨尔瓦厅第一排，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靠后的观察员席位换到了WTO最抢眼的席位。面对全场的热烈鼓掌和其他成员的祝辞，龙永图依然不动声色，默默无言，谁也猜不透他的心底是风平浪静或是惊涛澎湃。龙永图是幸运的，古往今来，甘愿为国效力的官员数不尽，而能够梦想成真的官员并不多。

15年，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实在是极短的一瞬，而对于所有参与或关注这场马拉松谈判的人来说，15年又是一次十分漫长曲折甚至带有戏剧性色彩的征程。15年来，伴着复关和入世谈判桌上的硝烟，中国在其现代化、市场化之旅中经历了数次的悲喜浮沉。我们无法断定有多少人会为中国入世欢笑或落泪、迷惘或憧憬，我们也无法量化预测WTO将给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利与弊、得与失，但是，站在WTO的

门槛上，也许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那曾经的重重心结，检视一遍这 15 年的风雨足迹：中国为什么要入世？入世谈判为什么如此艰难？15 年里，有哪些事、哪些人值得镌刻于岁月的长卷？

中国几十次派遣庞大的代表团去日内瓦谈判，只是为了在一座灰色旧楼里拥有一张退色发白的椅子？

不知是否天意，2000 年 5 月 19 日，我从瑞士洛桑到达日内瓦。当地旅游局一位官员告诉我，就在几小时前，中国与欧盟签署了中国入世双边协议。这消息让我进餐时多要了两份甜点。而大约半年前即 1999 年 11 月 15 日，我有幸现场目睹了中美最后一轮有关中国入世的谈判。此时，我很清楚，中国入世双边谈判的最主要障碍已经扫除了。尽管是去考察瑞士旅游业发展，我还是向主人提出想看一看 WTO 总部，理由很直接：我跟踪报道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多年。

这个请求得到了满足。

然而，当我走进莱蒙湖畔那座不起眼的灰色旧楼，抚摸着一排排退色发白的坐椅，竟有一丝片刻的恍惚：自 1986 年始，中国几十次派遣庞大的代表团来此谈判，并且每前行一步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就为了在这样平淡无奇的老建筑里拥有一把椅子？

现实却是，这座旧楼所代表的机构是当今世界经济三大

支柱之一。WTO 前身为关贸总协定（GATT），它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是在二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人们沐浴了血与火的洗礼后痛定思痛的结晶。

GATT，是全球最具广泛性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主要职能有三：制定并监督执行国际经贸规则；组织各成员进行开放市场的谈判；建立成员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因而被喻为“经济联合国”。1947 年 10 月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23 个参加国随后进行了长达 7 个月的关税谈判，达成了 123 个削减关税的协议。因美国政府一心争夺对外政策主导权，关于国际贸易组织的提案没能在国会通过，这一计划随即夭折。

不过，原本作为国际贸易组织一部分的关贸总协定作为政府间协议，不需国会批准，因此保留下来，临时适用。这一“临时”，就是近半个世纪。从 1948 年到 1979 年，GATT 共组织了 7 轮谈判，使缔约国关税水平降低了 28%。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

令人遗憾的是，80 年代初期，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壁垒重现，以自由贸易为目标的 GATT 体制受到了严重威胁。

沈觉人的 8 人代表团让西方颇感意外。坎特说：“美国拒绝签署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萨瑟兰顿时脸色煞白。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倡议发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孰料“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经过3年的酝酿和筹备，GATT决定召开缔约方部长级大会，正式发动第八轮谈判。会址确定为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因此这轮谈判也被称为乌拉圭回合。

1986年9月15日至20日，90个缔约方的2000余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出现了由中国经贸部部长助理沈觉人带领的一个8人代表团，让西方媒体颇有些意外。会议通过宣言：决心制止和扭转保护主义，消除贸易扭曲现象；决心维护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和促进关贸总协定的目标；决心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具有生命力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

还不是缔约方的中国，能否实质性地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呢？大会主席、乌拉圭外长伊格莱西雅斯申明：“所有新一轮的参加者有权参加所有问题的所有谈判。”这样，中国以全面参加方的身份参加了整个乌拉圭回合。

乌拉圭回合规模空前，触角伸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长期游离在GATT之外的农产品贸易和纺织品贸易也开始回归总体贸易自由化体系。

1993年底，GATT总干事萨瑟兰敲响手中的木槌，长达7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结束。

翌年4月15日，该回合各参加方再次聚集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签署《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轮到美国代表坎特时，他走上主席台与GATT总干事萨瑟兰握手寒暄，突然，坎特神情严肃地对萨瑟兰说：“我通知你，美国拒绝签署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萨瑟兰顿时脸色煞白，坎特转而哈哈大笑，告

诉对方自己只不过开了个玩笑。

这一天，中国也以新一轮谈判全面参加方的身份，由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代表政府在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上签字。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GATT 对世界贸易都是功不可没。几十年来，GATT 的组织构成也由单纯的“富国俱乐部”演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的大众舞台。到 1994 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降至 4%，发展中国家则从 50% 降至 14% 左右。1995 年 1 月 1 日，WTO 诞生。GATT 消逝了，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中国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得靠外力推动，入世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穆尔说：“中国 20 年前就该加入我们了。”

毋庸讳言，近 20 年来尤其是冷战之后，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加快，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绝大多数国家虽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各有不同，但都相继选定了市场经济之路，并纷纷投身于新技术革命。跨国公司打破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信息技术、知识经济日新月异，大大缩小了时空距离，你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拥抱世界。WTO 奉市场经济为圭臬，在推进全球化中扮演着主角。80 年代中期以来，是否参加 GATT 和 WTO 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衡量一国是否负责地

加入国际社会、该国经济是否与世界经济衔接的重要尺度。目前，WTO140多个成员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95%，投资额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量的80%。获得WTO的一个席位，等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多张通行证。

中国需要WTO。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收益和风险上并不均等，但发展中国家若不顺应全球化潮流，就只能永远落后，被动挨打。目前，中国在诸多领域已具备了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能力，但因长期被排斥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之外，不得不主要依靠双边磋商和协议来协调对外经济关系，这使国内企业和产品在打入国际市场时受到了许多歧视性或不公正待遇。比如，中国是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出口国，却受“多种纤维协定”下主要进口国的配额限制，竞争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又如，丰富低廉的劳动力是中国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也极具竞争力，但不少发达国家将中国视同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用第三国价格对我出口产品予以反倾销调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受反倾销危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加盟WTO，中国不仅享有品尝全球化成果的权利，还能够参加制定有关游戏规则，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把握主动权，并且可以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贸易战中占据有利位置。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中国肯百折不回地争取入世，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内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的抉择。中国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得靠外力的推动。从更深广的层面来看，WTO是中国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际组织，这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外交行

动，也是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的显著标志和强烈信号。所以有人曾指出，入世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当然，WTO 也需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占世界 1/4 的人口，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值均跃居世界第七位，吸收外资连续 8 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其中，与 WTO 成员间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90%，来华落户的跨国公司多来自于 WTO 成员。2001 年，中国申奥成功，世界给中国投了票；中国还成功主办了 APEC 年会，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尊重。显然，没有中国加入，WTO 将有失完整，不能真正体现其世界性。入世后，中国巨大的需求潜力将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为全球提供一个最诱人的大市场，这是中国将要对人类作出的突出贡献。据初步估算，“十五”期间，中国将进口约 1.4 万亿美元的设备、技术和产品，这会给各国工商界创造无限的赚钱机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去年在敦促国会尽早批准中美入世双边协议时大声疾呼：“不让中国入世，你们将后悔 20 年！”WTO 几任总干事都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同样的意愿：WTO 亟需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和平衡，历史交付了中国这一使命。2000 年 2 月 18 日下午，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一个套间，现任 WTO 总干事迈克·穆尔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坦言：“中国 20 年前就该加入我们了，我和我的办公室愿为此提供最大帮助。”紧接着，他专门飞了一趟华盛顿，游说国会山的议员们。2001 年 11 月 10 日晚，当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会议通过中国入世决定后向穆尔致谢时，这位即将卸任的老人眼中分明泪光闪动。我想起他对我讲的一句话：“退休后回忆为中国入

世做过的事情，我会感到骄傲。”

为什么是“复关”而不是“入关”？半个世纪前台湾退出关贸总协定的原因，一直是个谜。

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 80 年代初到 1986 年 7 月，主要是酝酿、准备复关事宜；

第二阶段从 1987 年 2 月到 1992 年 10 月，主要是审议中国经贸体制，中方要回答的中心题目是到底要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第三阶段从 1992 年 10 月到 2001 年 9 月，中方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

事实上，中国与关贸总协定有着深久的渊源。

在入世谈判之前，中国称谈判是“复关”而不是“入关”，即恢复中国在 GATT 中缔约国地位。那么，所谓的“恢复”从何谈起呢？

GATT 是从 1948 年开始临时适用的，当年 4 月 21 日，彼时的蒋介石政府签署了 GATT 《临时适用议定书》，成为 GATT 23 个创始成员之一。

此后不久，政局天翻地覆，新中国成立。

毛泽东政府宣布，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蒋介石

石集团根本无权代表中国。旧中国签署的一切国际协定均需要重新审议，然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承认。但在美国支持下，中国在联合国和很多国际机构包括关贸总协定中的合法席位仍然被台湾当局非法占据着。

但是，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由其“联合国常驻代表”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按《临时适用议定书》第5款的规定退出GATT。次日，联合国函告GATT执行秘书（1965年3月改称“总干事”），称已答复台湾“外交部长”退出并自1950年5月5日起生效，并用电报形式向其他缔约国政府作了通报。

台湾为什么要退出关贸总协定，始终是个众说纷纭的谜。

旅居美国的关贸老专家时钟策生前曾道出原委：新中国成立后，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国家疏远台湾，与其承受被驱之结局，倒不如主动退出在面子上更好看；同时由于台湾对大陆失去控制，无法履行总协定规定的义务，而且台湾当时尚无大量工业品出口，总协定降税对台无实际意义。但关键的原因是美国施加了压力，美国担心新中国利用台湾留在总协定中的席位，获取其他国家关税减让的好处。这纯属杞人忧天，当时新中国的贸易额微不足道，而且主要是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不管怎样，台湾是秉承了美国的旨意，退出了关贸总协定。

台湾退出后不久，GATT在拟定《托奎议定书草案》的缔约方名单中删掉了中国。捷克等与新中国友好的国家立即表示怀疑台湾退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这一除名表示异议，并建议询问北京对总协定的态度。在第五届缔约方大会上，捷

克代表同意把前言部分中的缔约方名单全部删除，但认为可以补充一个注解，说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尚未确定其对总协定的立场。英国当时对这一退出的有效性也有保留，在其正式出版的总协定文本中也有一条上述内容的脚注。1951年7月27日捷克就美国撤销与中国政府的减让一事在总协定内散发了一份通函，声明捷克不承认中国退出总协定的通知有效，美国撤销同中国的减让是非法的。

1965年1月21日，台湾提出观察总协定缔约方大会的申请，同年3月召开的第22届缔约大会讨论了这一问题。捷克、瑞典、英国、荷兰、丹麦、挪威、南斯拉夫、埃及、波兰、印尼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声明，他们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法国和古巴反对台湾派观察员。会议主席指出，签署哈瓦那会议最后文件的缔约方在退出之后又希望派观察员参加总协定会议的有黎巴嫩、叙利亚和利比亚三国为先例。此外，全体缔约方一直遵循《哈瓦那宪章》第86条所体现的政策，即在根本性政治问题上，避免以任何方式作出裁决，而是根据联合国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行事。全体缔约方允许台湾作为缔约方大会观察员并不损害各缔约方或个别缔约方对承认该政府的立场。执行秘书还根据联合国法律司的意见指出，在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权问题与该组织其他成员对该政府的承认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他还引述了联合国秘书长1950年3月9日提交安理会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的一种得以遵守的惯例，即成员国可以投票接纳一个它没有承认或没有外交关系的政府，而这种投票并不意味着承认或准备建立外交关系。虽然有一些国家反对和表

示异议，但全体缔约方依照议事规定和总协定以及联合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惯例，同意台湾当局派观察员列席缔约方大会。1968年3月29日台湾还出席了选举GATT总干事奥利弗·朗的国际贸易组织筹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

假设2758号决议通过后中国就申请复关，是否会比以后少一点阻碍？“你是资本家，我是共产党，怎么可以合作呢？”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著名的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部长乔冠华在会场开怀大笑的镜头成为新闻摄影史上的经典。接着，中国在其他国际组织的席位很快被恢复了。

然而，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席位仍然空缺着。

20多年后，当中国复关谈判进入异常艰苦的阶段，人们一度感到困惑：假设2758号决议通过后不久，中国马上就提出复关申请，借助当时的形势，是否会比以后少一点阻碍和波折？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70年代初的中国面对西方的经济封锁和变幻莫测的冷战态势，仍在实行封闭的中央计划经济，对外贸易高度垄断，外商投资更是零。而关贸总协定要求开放市场，让外国产品最大限度地进入。双方的距离差之千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季崇威对我讲述过这么一件事：7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参观

福特公司时，对方提出愿意与中国合资办企业。中方官员却吓出一身冷汗：你是资本家，我是共产党，怎么可以合作呢？

观念和体制上的南辕北辙，使中国与 GATT 第一次失之交臂。

1971 年 11 月 16 日 GATT 举行的第 27 届缔约方大会做出决定，“中华民国”不再享有缔约方大会的观察员地位。随后，台湾代表声明对其观察员地位的任何否认是不公正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对全体缔约方就中国代表权问题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提出强烈抗议。但已于事无补。

虽然复关时机并不成熟，但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并未完全忽视这个机构的存在。

1971 年 11 月 18 日，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研究 3 个问题：1. 对关贸总协定的看法；2. 对这个组织我们持什么态度；3. 中方如何表态。

同年 11 月底，外交部和外贸部向国务院提出了“暂缓参加”的建议。

长久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各阶层对开放问题讳莫如深，在 70 年代末以前这几乎是个严禁涉足的“雷区”。对关贸总协定的认识也不例外，1959 年中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报告的题目赫然写着：《关贸总协定是帝国主义压榨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很多中国人对于开放持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观点：赞成抽象的对外开放，反对具体的对外开放；赞成长远的对外开放，反对眼前的对外开放；赞成别的部门的对外开放，反对自己部门的对外开放，甚至将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对立起来。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

开放的发展使中国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世界，对外贸易不再仅仅是调剂余缺换取外汇的手段，而成为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际通行惯例和游戏规则，是中国在与世界打交道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GATT 似乎不再是事不关己和遥不可及了，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话题逐渐提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1980 年 8 月 4 日，中国应邀出席了国际贸易组织临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参加选举了总干事邓克尔。这是因为当年中国是监督国际贸易组织建立临委会的 18 个成员国之一。国际贸易组织虽然夭折，但这个临委会执委会在法律上并未消失，选举临时适用的关贸总协定总干事就是其职责之一。后来选举下一任 GATT 总干事萨瑟兰和 WTO 首任总干事鲁杰罗时中国也都参加了。

1982 年 11 月，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 GATT 第 38 届缔约国大会。代表团团长卜昭敏会见了总干事邓克尔。这是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第一次对话。同年 12 月，国务院批准经贸部《关于参加关贸总协定的请示》。坚冰，总算开始消融了。

考察匈、南、巴，得出结论“利大于弊”。陈文定说：“越往后拖，解决中国席位问题难度越大。议定书一定要一劳永逸。”

1983 年 8 月，经贸部、外交部、海关总署联合组成了一

个GATT考察组，考察对象经过精心选择：正在实现改革的计划经济国家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巴基斯坦。

这三国对于加入GATT有两点相同的体会：第一，尽管需要承担开放市场的义务，但可以从非歧视待遇中得到更多的好处；第二，尽管要受到多边规则的约束，但与单方面的贸易限制相比，显然前者更具公正性。

考察的结论令人振奋：复关利大于弊。

由于预计到复关的艰难，中方采取了先入外围的策略。《国际纺织品协议》是在GATT主持下由纺织品主要进出口国家和地区就国际纺织品问题达成的一个单独协议。1983年下半年，经过多方磋商，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纺织品协议》的工作，并于次年1月18日，成为该协议的正式成员。

1984年2月，经贸部部长陈慕华主持部长办公会，会议决定：

1. GATT是个非常特殊的多边国际协定，要对它的条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2. 在正式参加前，要较长时间地以观察员身份参加GATT的活动，了解情况；

3. 参加GATT要有一大批适应此项工作的干部，国内基本上没有这方面人才，要有计划地加速培训。

事实证明，这些准备十分必要，因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对手，不仅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同时拥有一批在多边体系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谈判老手和法律专家。

1984年11月6日，GATT理事会一致通过中国的申请，决定给予中国观察员地位。

中国接近 GATT 的动作，引起了世界的注意。西方国家智囊机构认为，中国如何与 GATT 的贸易体系结合起来的问题太复杂，短期内难以解决。他们的依据是，GATT 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其作用是限制缔约方干预市场的行动。但中国决定生产和供应的不是价格，而是国家的计划指令。

1985 年 10 月 3 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非正式磋商。美国贸易副代表史密斯说，自 1950 年以来，中国与关贸总协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需要全面研究这些因素对中美经贸关系和对国际贸易体制的总体影响，因此，谈判将是非常艰难的。

欧共体驻 GATT 大使陈文定是一位越南裔的法国人，熟知东方文化及中国。他说，中国块头这么大，轻纺产品的出口增势这么猛，都令中国的贸易伙伴感到害怕，而多边贸易体制则会确保中国所得到的利益，越往后拖，解决中国席位问题的难度越大。两年后他在宴请中国代表团团长沈觉人时，说出了真实的想法：“缔约方要吸取日本的教训。议定书一定要一劳永逸。”他是指 50 年代日本入关时，美国单方面放日本一马，未能有效约束，现在终成经济劲敌。言下之意，对中国不会轻易放过。

香港先于中国内地成为 GATT 缔约方。“一国四席”体现了中国历史的特殊与复杂。钱嘉东向邓克尔递交了申请照会。

1986 年 1 月 4 日至 11 日，GATT 总干事邓克尔首次访

华。作为中国与缔约方之间的中间人，他带来了缔约方对中国复关的一些看法：

一、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增长潜力大，可能会对世界市场造成冲击，威胁缔约方利益；

二、怀疑中国经济体制能否适用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和规定；

三、关注中国的价格体系，因为这与中国的关税是否起作用有直接关系；

四、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变相的出口补贴；

五、不了解中国的外贸体制，特别是外汇管理体制和进口许可制度。

中方对上述问题作了原则性解释，但这些解释对消除缔约方疑虑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以后长时间的中国外贸制度答疑过程中，缔约方曾反复地提出其疑虑。耐人寻味的是，香港在此期间成为 GATT 缔约方。

1984 年，中英就香港 1997 回归中国的问题达成协议后，香港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问题多次被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讨论。作为英殖民地，香港在关贸总协定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一直由英国政府代其处理。许多其他原西方的殖民地在脱离宗主国独立后，是根据 GATT 第 26 条 5 款 C 项申请，并不经谈判获得了 GATT 的缔约方的地位。

但香港与其他殖民地有所不同：

一、香港不是独立，而是回归中国；

二、1997 年将收回香港的中国本身尚滞留在 GATT 之外；

三、中国收回香港后将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将在对外贸易方面享受完全的自主权。

基于这些特点，解决香港在 GATT 的地位需要打破陈规。GATT 第 26 条 5 款 C 项是允许单独关税区，即主权国家，在对外贸易关系方面享有完全自主权的政府参加关贸总协定，香港事实上已具备这种条件。问题是由谁来代表香港宣布其单独关税区的地位和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

1986 年 3 月 11 日，中英两国原则达成协议，由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称根据关贸总协定第 26 条 5 款 C 项，香港被视为其缔约方，以便在 1997 年后，香港可用“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保留缔约方的地位。

英方谈判代表魏德巍事后表示：“中方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创造性和政治家风度。”

1986 年 5 月 22 日，GATT 理事会主席宣布香港成为缔约方。个别缔约方曾担心中国收回香港后，会引起香港在关贸总协定中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缔约方的利益。欧共体代表陈文定还曾私下对中国代表分析，美国担心中国将来在关贸总协定中有 4 个席位。这样做如同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中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中国的表决票数多了而不会影响中国的主权。

但无论如何，香港缔约方的地位是以缔约方达成共识的方式得以解决的，1997 年后继续保持这种地位也是确定无疑。一次在 WTO 理事会上，主席习惯性地，请香港代表发言。这位代表当即纠正：“不，我是中国香港的代表。”

1991 年 1 月 11 日，澳门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为 GATT 的

缔约方。

2001年11月11日，就在中国入世第二天，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台湾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加入WTO的决定，这是WTO认同中国在入世问题上“我先台后”立场的体现。

一国四席，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与复杂，也显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经过长达4年的酝酿、观察和准备，中国政府于1986年作出决定：正式申请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7月10日，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钱嘉东通过GATT副总干事马吐向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了申请照会。4个月之后，GATT新一轮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拉开帷幕。邓克尔说：“中国的申请是获得参加新一轮谈判的钥匙。”

2001年初冬，就在中国入世的几天后，我找到了当年钱嘉东递交的照会原文：

尊敬的总干事先生：

我荣幸地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忆及中国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现已决定要求恢复中国在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

中国目前正在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基本国策，并将在未来坚持这项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信，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进程将有助于扩大同缔约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中国作为一个缔

约国参加总协定的工作将有助于实现总协定的目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期望得到与其他发展中缔约国同等的待遇。

中国准备同缔约各方就恢复缔约国地位问题进行谈判。为此目的，它将提供有关经济制度和对外贸易制度的情况。

阁下如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转达缔约方全体，加以考虑，我将对此深表谢意。

顺致崇高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 钱嘉东

1986年7月10日

对谈判时间表的预测令各成员大跌眼镜。“白菜豆腐”并不好咽。吉拉德到头来竟干了14年半！

毫无疑问，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

自中国递交复关申请起，国内外无数次在预测这场谈判的时间表，日内瓦甚至展开了一场预测大赛。但谁也不曾料到，由于谈判逐步被“政治化”及其本身的艰巨性、复杂性、特殊性和敏感性，这一谈就是15个春秋，用朱镕基总理的话讲，“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中国代表团换了沈觉人、佟

志广、谷永江、龙永图 4 任团长，美国换了 5 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换了 4 位。从 1987 年 10 月 22 日到 1994 年 10 月 20 日，GATT 中国工作组共举行了 19 次会议，从 1996 年 3 月 22 日到 2001 年 9 月 17 日，WTO 中国工作组共举行了 18 次会议。

1986 年 2 月 2 日，陈文定在约见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公使参赞刘显铭时说，美国人认为解决中国参加关贸总协定的谈判需要 5 年，他估计 3 年差不多。

然而，谈判的结果令他们大跌眼镜，各种预测一次又一次落空，以至于在谈判后期，任何人都不敢再贸然提出时间表，因为 GATT 历史上任何经验（比如，实质性谈判一般 1 年，最短 9 个月），都不足以用来判断中国谈判微妙多变的形势。曾参与向国务院起草中国复关倡议的原海关总署关税司司长吴家煌说，1986 年不少外国友人对中国申请复关极为高兴，认为这事儿就像白菜豆腐一样是很容易入口的一道菜，哪知这白菜豆腐没能一次吃下去，一直咽了 15 年。

1987 年 6 月 17 日，瑞士驻 GATT 大使吉拉德出任中国工作组主席，他对起草《乌拉圭部长级宣言》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出任极具挑战性的这一职务，个子不高的吉拉德显得踌躇满志，如果能成功地组织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他的职业生涯将因此添上辉煌的一笔。履任伊始，就有人同吉拉德开玩笑说，你这个主席也许要当 10 年。他不以为然地大笑，可是到头来竟干了 14 年半！2001 年 9 月 17 日，在 WTO 中国工作组第 18 次会议宣布通过中国入世所有法律文本后，许多人对吉拉德说的第一句话是：“您终于可以退休

了!”

邓克尔“考倒”了重庆市市长肖阳。“头等舱”插曲使中方感到脸上无光。

考虑到谈判的复杂性及跨部门的特点，中国政府于1986年8月5日成立了国务院关贸总协定部际协调小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协调谈判中的重大政策问题。组长是国务委员张劲夫，副组长是经贸部部长郑拓彬、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海关总署署长戴杰。成员包括：

经贸部部长助理	沈觉人
国家计委副主任	甘子玉
国家经委副主任	朱镕基
财政部副部长	田一农
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	王平武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邱 晴
人民银行外事司总经济师	戴伦章
农牧渔业部副部长	陈耀邦
体改研究会副会长	陶 力
国务院法制局副局长	李培传
国务院特区办主任	何椿霖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郑家亨
国家物价局副局长	胡邦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凌则提
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季崇威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

研究所所长

浦山

1987年10月，应郑拓彬之邀，邓克尔携特别助理侯赛因二度访华。他们先由深圳入境，参观了我国南方一些地方，所到之处，邓克尔最关切的就是当地的外贸。在重庆，这位GATT总干事早上6点就起床去大街小巷体验生活。当时山城烟囱林立，码头杂乱，邓克尔深感中国与西方经济的现实差距，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复关是有道理的。

邓克尔跟接待他的重庆市市长肖阳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对话——

邓：市长先生，你知道关贸总协定吗？

肖：我仅知道一丁点，不多。

邓：你知道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吗？

肖：我知道最基本的规则是“最惠国待遇”。

邓：你知道现在准备进行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要讨论哪些议题？

肖：我不清楚。

之后邓克尔有点感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让所有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者知道一点贸易规则是很重要的。”十几年过去，这句话被证明是“金玉良言”。

此次访华的成果总体上让邓克尔很满意，但在离京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邓于10月31日取道香港返回日内瓦，中方为邓预订了民航105班机的头等舱并已确认，但在办理登机手续时，邓

竟被告知头等舱满员，没有邓的座位。负责接待的经贸部交际司努力与民航交涉终无结果，到机场送行的沈觉人感到脸上无光，不愿亲自向邓说明，于是未及送邓登机便告辞离开了贵宾室。中方陪同人员十分抱歉地告诉了邓，邓嘴上说坐什么舱位都行，但脸上明显露出不快。这件事使邓至少感受到中国在管理和服务方面与国际水平存在的距离，绝非个别现象。与国际接轨，谈何容易！

资格审查中美国说没听过还有一种“商品经济”。中方的备忘录半遮半掩、含糊其辞，“粮棉油三挂钩”外国人听不懂。

复关谈判之所以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与缔约方开始实质性谈判之前，需要接受对方对中国外贸体制的审议。可以说，中国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格审查；GATT 缔约方进行的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格审查。

GATT 以及后来的 WTO 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开放市场等，都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因此，申请加入方需要全面系统地介绍其经济贸易体制，供缔约方审议确定该体制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要求。

我曾问几位中方谈判人员，为什么中国复关的体制审议阶段长达 5 年？回答是：咱们的体制弊端太多。

进入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始终是朝向市场化的，但

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而到 1991 年，市场经济的概念还被禁用。我们使用过“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概念，还使用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美国就曾在审议过程中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计划经济，一种是市场经济，没听说过还有一种“商品经济”，要求中方明确回答到底是搞哪一种经济体制。

1987 年 2 月 13 日，钱嘉东大使向邓克尔递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这个文件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外贸政策体制，包括外贸管理、海关税收、商品检验、价格、外汇管理和特区政策。向一个国际机构提供如此全面的情况，并准备接受审议，由几十个国家在那儿评头论足，这对中国是第一次。

邓克尔看完备忘录非常坦率地说，他觉得写得比较粗糙，阐述不透，难以让人信服。他预计缔约方会提出很多问题，审议工作将非常艰难。

客观地讲，这份备忘录并非写得粗糙，而是当时中国的体制有许多“独特”的东西，有些与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又不愿意示人，不得不半遮半掩，含糊其辞，西方人很难理解。应当承认，要把自己的体制拿出来让别人审议，承受详尽、繁琐甚至苛刻的条分缕析，那时的中国还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

在一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当中国代表介绍国内的“粮棉油三挂钩”“三提留、五统筹”“议转平”等等只有中国人才懂的政策语汇时，翻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把意思准确地传达给缔约方，许多西方代表无奈地摘下了耳机。

自 1988 年 2 月开始的连续几次工作组会议上，中国代表

团就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外贸制度进行了4次口头答疑，对缔约方提出的数以千计的大小问题一一作答。缔约方承认，“上了一堂史无前例的教学课”。

1988年2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基本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个共20条的规定是中国外贸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个重要步骤。由此，中国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集中管理、统一经营的外贸管理体制。一“包”一“放”，使中国的外贸体制真正向国际规范靠拢，这对刚刚起步的复关谈判是个很大的推力。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谈判陷入僵局。十四大报告被传真到日内瓦，谈判体制审议的核心问题迎刃而解。

1989年2月28日至3月1日，中国工作组第6次会议在前几次会议答疑的基础上，开始对中国的外贸制度是否符合关贸总协定做出评估。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结论是：中国正在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但与关贸总协定的体制仍有较大差距。

风云突变。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以此为对华实行制裁。复关谈判陷入僵局。

怎样才能重新启动谈判？

邓克尔和吉拉德对中国代表团首任团长沈觉人说：“你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用事实使谈判对手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

“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前，布什政府急于想把中国尽快拉进关贸总协定，以便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树立经济转轨的样板。风波之后，美虽宣布“暂停高级官员互访”，但终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久，布什就派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问北京。邓小平对他说，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发展。

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持人巴巴拉·沃尔特斯采访时指出，美国对中国制裁是不明智的。从长远讲，制裁中国损害的不仅是中国，对美国的利益也有损害。

美国人到底是美国人，利益驱动永远排在第一位。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它断然不肯放弃。而打开中国市场最合适的敲门砖，就是让中国通过谈判加入多边贸易体制。这一点，山姆大叔总算想明白了。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说：“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必须认识到，进入中国市场是我们的国家利益所在。”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此言一出，石破天惊。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11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大的报告被迅速传真到了日内瓦。复关谈判审议阶

段的核心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中国代表在日内瓦郑重宣布，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除此之外，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其一般特征来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并没有什么区别。

会议当即作出决定，结束对中国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从此，复关谈判进程不仅重新启动，而且步入了市场准入的实质性阶段。中国第二任谈判团团长佟志广由衷地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和十四大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中国经贸体制的审议就不可能通过。换句话讲，如果没有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就没有复关和入世谈判。

这场谈判就像打一个总在移动的靶子。“WTO 相当于一个党支部，美国就是支部书记，欧盟就是组织委员。”

实质性谈判包括两条主线：一条是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即开放市场的谈判；另一条是围绕起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995 年之前为复关）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主要工作是规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所享有的权利和需要履行的义务。

自 1986 年至 2001 年，在双边谈判中，中国与要求谈判的 GATT（后为 WTO）37 个成员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拉锯式较量。

这 37 个成员是：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拉脱维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乌拉圭、墨西哥、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秘鲁、古巴、瑞士、挪威、波兰、冰岛、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从 1997 年 5 月与匈牙利最先达成协议，到 2001 年 9 月 13 日与最末一个谈判对手墨西哥达成协议，这期间起伏跌宕，变数频现，时而山重水复，时而峰回路转。有人曾作过一个比喻：这场谈判就像打一个靶子，每次中方瞄准靶心时，靶子却总是莫名其妙地移动开去。

但是，中国最主要的对手是美国，其次是欧盟。前者与中国谈了 25 轮，后者与中国谈了 15 轮。

双边和多边相结合是复关和入世谈判的特质。工作组作为多边框架，其工作基础是申请方与缔约方的双边磋商，同时这种双边磋商的结果最终要多边化，即得到所有工作组成员的首肯。中国提出复关申请后，非常重视与主要缔约方特别是美国的双边磋商。尽管根据总协定的加入程序，最终要理事会以三分之二多数投票决定是否批准加入国的申请，但那只是形式而已，工作组在提交理事会投票之前，必须在全体工作组成员之间达成共识。而如果一个主要缔约方不同意的话，工作组根本不可能进入到投票程序。正因如此，与主要缔约方的双边磋商十分重要。

国务委员吴仪在她担任外经贸部部长时多次说过，一个积极分子申请入党必须经过党支部表决同意，WTO 相当于一个党支部，美国就是支部书记，欧盟就是组织委员，虽然

中国要想加入进去得让多数成员点头，但假如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不同意的话，这一关绝对过不了。

石广生曾向我透露：在双边谈判的 37 个对手中，其他成员都是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提条件，比如泰国，只要你中国多进点他的香米就行。厄瓜多尔无非让你多买他几串香蕉。委内瑞拉只关心乳化沥青。菲律宾的主攻目标是椰子油。只有美国和欧盟的谈判是包罗万象，事无巨细。剪不断，理还乱。

江泽民的十六字方针：“不急不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水到渠成。”李岚清说：“如果客人带清洁纸还可以，大功率的吸尘器我们吃不消。”

1993 年，江泽民在西雅图会议上与克林顿首次会面时，亲自给这场谈判确定了三条原则：

- 一、没有中国参与是不完整的；
- 二、中国必须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
- 三、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针对美欧等西方国家在谈判中的高要价，江泽民还确立了十六字方针：“不急不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水到渠成。”

这些原则和方针，对复关和入世谈判的指导意义非同小可，使中方在谈判中一步步扫清各种障碍，一步步走向预期目标。

这里，我们不妨重点解剖一下中美谈判和中欧谈判。

美国也好，欧盟也罢，无非是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而中国随着实力增强和开放度的提高，也需要逐步开放市场。问题就在于如何开放市场。

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坦陈：谈了15年，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了15年。

如果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谈判早就结束了。谈判过程之难，拖延时间之长，正说明我国为维护自身根本利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谈判多打几个回合，也为国内产业和企业争取了固本强体的缓冲期。

我记得1998年10月29日，早已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来访的欧盟主席桑特时，双方曾有一段饶有趣味的谈话：

桑特：希望中国尽快向欧盟的投资者发出具体的开放市场信号，这样做有利于中国加入WTO。

李岚清：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是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为什么必须是渐进的呢？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请客人的时候，要把房间打扫干净，打扫干净4个人的地方，就请4个客人；打扫干净8个人的地方，就请8个人。我们不希望客人把衣服弄脏了。有些朋友说，没关系，客人可以带大功率吸尘器。我们说，如果客人带清洁纸还可以，大功率的吸尘器我们吃不消，尤其是索罗斯那样的“吸尘器”我们最害怕。我们今后有办法对付大功率吸尘器时，可以对索罗斯开放，但不是今天。

中方一贯坚持，开放市场的条件和速度必须与中国的经

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中国必须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加入WTO。谈判的焦点就在这个上头。中方同意的市场开放是逐步的、有条件的。中方提出在电信、金融等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合资企业中方要掌握主导权，外方不能控股。有的行业不能马上放开，要经过3年、5年、7年的过渡期。双方争的就是这些条件。

中美第一轮双边磋商，纽柯克提出“5项基本原则”。看了深圳和厦门，美方更不愿意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和美国，这对历史上曾经兵刃相见的冤家，在和平年代的贸易关系变得难解难分。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1978年中美贸易额仅为19亿美元，2000年增长到745亿美元，双方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目前在华投资项目有3万多个，协议金额660多亿美元。

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贸易是超越意识形态障碍的桥梁。虽说贸易关系常常会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但其本身的魅力无可阻挡。美国商人不会忘记近20年来，中国共买了美国上亿吨小麦，近千架飞机。

中美谈判范围广、内容多、难度大。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要价很高，态度强硬，谈判还不断受扰于各种政治因素。

如果把谈判过程记录下来的话，将是一套很有意思的文献，可以作为一流大学有关院系的教学“宝典”。在整理本文的写作思绪时，面对厚厚几大本中美谈判原始资料，我有些不知所措，只能选取两个“有始有终”的时段来试加描述：一个是1986年中美第一轮谈判，一个是1999年中美最后一轮谈判。其间跨越了13年的艰辛和摩擦，令人平添岁月蹉跎之叹。

1986年11月，中美第一轮双边磋商在北京举行。

美国负责关贸总协定事务的助理贸易代表纽柯克率美国代表团于11月18日乘国泰330航班自香港抵京，随行人员共5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关贸总协定处处长克莱茵女士、中国处处长威廉·阿布内特、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副处长白莉德女士、美国商务部关贸总协定事务办公室主任波默纶斯女士、美国商务部中国和香港处官员李杰飞。美驻华使馆经济参赞魏德曼和一秘唐瀛洲也参加磋商。

中国代表团由沈觉人率领，成员有王天策、李国栋、陈炳华、吴家煌、陈健、施建新、董尚明、姜韧、傅自应、朱鸿杰和王世春。

20日，磋商开始。沈觉人简短致辞后，纽柯克发言。40岁出头的纽柯克说话语调迟缓，并不总是直视对方。与他的后任道斯金相比，谈判风格有很大的不同。纽柯克给人以较为务实的感觉，不像道斯金那样骄横跋扈。

纽柯克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欢迎和希望中国进入关贸总协定，美国将同中国手拉手地进行谈判，而不是互相指责和争吵。美国相信，中国参加国际贸易体制将给各方带来积极成果，也有助于中国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

纽柯克说，美国完全赞同中国增加市场机制，下放管理权，采用反映供求关系的价格体制；并认识到中国是在决心实施改革的形势下寻求获得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地位。但是，由于很多因素会影响中国改革的程度和速度，缔约方还不了解中国改革的进程，也无法设想这些改革将会很快产生一个更具市场机制的经贸体制。关贸总协定的条款是建立在进出口贸易适应市场价格变化的设想之上的，进出口商根据价格尺度自由作出商业决策。由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不是根据市场情况作出买卖决策，没有完善的价格机制，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国家不能承担通常的关贸总协定义务。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参加关贸总协定本身并不能扩大市场准入。所以，以往对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或是根据其加入文件中的特殊规定，或是在临时基础上加入的。基于上述原因，美国和其他缔约国将要在谈判过程中同中国讨论如何处理缔约方所提的各种问题的途经。

纽概述了美国在处理中国加入 GATT 问题上的五项基本要点，并认为应当反映在加入的文件，即议定书中。这五项要点包括：

一、统一性

关于中国贸易制度的统一性问题，纽指出，中国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条件，应在中国境内所有地区对来自所有国家的进口同样地加以适用。目前中国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对进口产品实行许可证、估价、边境收费和技术规章。这在关贸总协定中是不允许的。

二、透明度

关贸总协定第 10 条规定，一切法律、司法判决、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决和其他贸易管理规章都必须公布，并使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及其商人可以获得；在贸易待遇方面的变化也必须正式公布。目前在中国获取贸易机会和贸易规章方面的情况是捉摸不定的。这种状况必须改进。透明度问题还包括提供贸易和其他有关经济数据，因为缔约方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情况。

三、非关税措施

中国在海关估价、许可证、数量限制等方面的现行做法与关贸总协定条款不一致，需要改变。中国长期中断在关贸总协定中的活动，现在应考虑参加东京回合达成的非关税壁垒守则问题。

四、价格改革

关贸总协定条款要求缔约国的价格体制反映生产要素和整个供求关系。中国目前显然还未在全面的基础上建立起这种价格体制。中国应在载有其参加关贸总协定条件的文件即议定书中提及实行这种体制改革的计划，并说明这种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范围。这一点对中国如何加入关贸总协定是至关重要的。以往缺少真正价格体制的国家加入关贸总协定，是基于承认关贸总协定条款不可能对其充分实施这一事实之上的。因此，中国正式承诺最终实行这种以价格为基础的经济改革是极为重要的。

五、特殊保障条款

中国正在向一个价格真正有效的经济体制过渡，但在中国建立起以市场价格为导向的经济体制之前，缔约方需要用

其他方法来确保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关贸总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因此有必要在中国参加条件方面列入一项市场扰乱条款、适当的解决争端的程序和对中国的进展进行年度审议的规定，直到不再需要这些规定时为止。

关于中国加入谈判的方式和时间，纽柯克说，中国是恢复还是加入的问题现在可不必谈，先谈实质性义务问题，这类问题解决之后，方式问题就很容易处理了。中国的恢复是一个独特的问题，在关贸总协定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我们也不需要先例。

纽柯克还对中国准备提交关贸秘书处的外贸制度备忘录草稿发表了评论，建议备忘录应当少用概念性措辞，更多地写入有关进出口政策与管理的具体内容。

沈觉人首先阐明了中国在解决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方面的基本立场，即以恢复的方式、承担关税减让的基本义务和享受发展中国家地位，然后对美方的五项要点作了简要的反应：

一、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关税制度是全国统一的。除了在4个经济特区执行比其他地区更加优惠的政策和具有更大灵活性之外，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贸易政策、措施和关税制度。如果出现不一致情况，那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将予纠正。

（美方听后，并不大信服。白莉德半开玩笑地说，下次谈判要到地方上去核实此点。）

二、中国将按照关贸总协定第10条的规定，递交和公布有关贸易法规和资料。在开放过程中尽量做到已有的法规透

明，尚待制订的规章，今后在制订后将及时公布。

（沈当场还向美代表团每位成员赠送了尚未公开发行的最新版《1986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三、关于非关税措施，有的涉及东京回合的守则，这些守则并不是关贸总协定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也正在对有关守则进行认真研究，将根据研究结果考虑是否参加。

四、中国正在进行价格体制改革。这是中国自身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到1990年，中国价格改革将逐步做到，除极少数主要商品由国家定价外，其余商品价格逐步放开，由企业根据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来自行决定。

五、关于价格改革目标实现以前的过渡期的有关措施，在一定条件下定期审议中国的改革情况是可以考虑的。关于增加市场扰乱条款，中国认为根据关贸总协定第19条保障条款，足以处理市场扰乱情况。要求中国接受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至于中国恢复的时间问题，沈提到在乌拉圭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尤特会谈时，尤特曾期望中国在一年内解决恢复的问题。但如果谈判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也是有耐心的。沈还表示在外贸制度备忘录的最后修改稿中，将尽量反映美方所提的具体建议。最后，沈提出，美国应消除国内立法障碍，履行其国际义务，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在中美之间实施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对此，纽柯克回避未作答复。

中美第一轮双边磋商，双方均表明了谈判的立场。纽柯克来华之前，曾分别到欧共体总部布鲁塞尔、加拿大和日本交换意见，欧、日、加都表示愿意由美国率先与中国磋商。美方所发表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其他主要缔约方对中

国复关的立场。由于初步了解了各自的立场，双方都对磋商结果表示满意。

22日，首次来华的纽柯克等人在游览了长城和十三陵之后，乘中国民航425航班经东京回国。自然，纽柯克和沈觉人并不知道，当这场双边谈判画上句号时，已是13年后。

其后不到半年时间里，中美又进行了两轮磋商。

这儿要提一笔的是，1987年4月，美国代表团先后参观了深圳和厦门，以了解中国的经济特区情况。深、厦之行对美国代表产生了两个客观作用。一是看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功效；二是因为深感特区发展速度之快，而未与其他落后地区相比较，代表们更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了。纽柯克说：“在深圳蛇口和厦门，我们看到了中国通过实施市场原则是何等有力地发展了经济贸易。经济特区调动了各方面的活力。”“我们相信，如果在其他地区也适用这些特区已经形成的条件，这将是中国的美好的未来。”同时他又说，“我在这一次访问特区过程中看到了中国的情况，使我怀疑中国是否真的要寻求‘欠发达’这个称号。”

中美最后一轮磋商好像捉迷藏。石广生拍案而起：“中国人怕外国人发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巴舍夫斯基躲到洗手间给克林顿打电话。朱镕基亲临现场。江泽民说：不打不相识。

1999年11月，中美第25轮双边磋商在北京举行。谁也

不敢肯定，这是中美最后一轮谈判。

当年4月，朱镕基访美。各方都寄望于朱的美利坚之行能够终结中美谈判。之前，中方派出先遣组，与美方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眼看大功告成，然而，克林顿政府慑于国内反华势力的高压，临阵退缩，失去了达成双边协议的机会。

朱镕基离开美国后，美国工商界似是大梦初醒，意识到美国政府错失大好机缘，一些商业巨子质问克林顿：“你这次为什么不跟中国签协议?!”

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WTO谈判中断，两国关系降到了建交20年来的最低点。

此后，美方多次要求恢复谈判。8月27日，克林顿致信江泽民希望讲和。中方高层从中美关系大局出发，在炸馆事件得到初步解决后，最终同意恢复谈判。9月10日，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利用APEC会议之机，在奥克兰进行了会谈，中方代表团由外经贸部、外交部、信息产业部、人民银行、保监会和国家机械局的主管人员组成。

10月17日，江泽民应克林顿请求与其就WTO问题通了电话。11月3日，克又写信给江。11月7日，两人再次通了电话，江泽民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双方商定在北京重开谈判。

11月10日上午，以石广生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和以巴舍夫斯基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再次坐在了一起。双方都派出了强大的谈判阵容。美国代表团包括总统经济顾问斯珀林、白宫亚洲事务主任李侃如、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驻华使馆临

时代办麦克海、助理贸易代表卡希迪以及财政部部长助理和商务部人员。中国代表团则由 15 个部委的有关人员组成。

这场谈判异常艰苦，几度中断，甚至有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双方好像玩起了捉迷藏。

巴舍夫斯基回忆说，1996 年，美日就签署半导体贸易协定展开谈判，“日本人能连着好几夜不睡觉，如果他们打算熬夜，我愿意奉陪到底。”在长达 54 个小时的谈判中，她只睡了 20 分钟。

然而这一次在北京，是中国人准备奉陪到底了。外经贸部的若干办公室里摆上行军床，龙永图的房间也不例外。

我没有问过巴舍夫斯基在中美这场谈判中睡了几个小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在美日谈判中的记录被打破了。

石广生强调，这次中美谈判是根据两国领导人的指示进行的，中国政府重视此次中美谈判，希望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争取“双赢”结果，达成协议。他强调了中方在最为敏感的电信、保险、汽车、音像等问题上的立场。

巴舍夫斯基和斯珀林则表示，这次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成功与否，都将载入史册。克林顿总统代表美方作出的巨大让步是史无前例的。如果双方达成一个好的协议，美国政府将全力以赴促使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简称 PNTR，即最惠国待遇）。

双方开始就电信、保险、汽车、音像问题进行具体磋商。这几个领域成为中美最后谈判的焦点。

为避免出现美方了解中方在其他所有问题上的灵活性后而最终拒绝接受中方在最关切问题上的要求，石广生坚持要

与巴舍夫斯基进行阶段性交换意见。11日凌晨，双方举行第二次小范围会谈。石再次要求巴对中方最关切的问题表态，巴建议双方专家继续就其他领域进行讨论，然后再全面评估。

11日下午，双方举行第三次小范围会谈。美方作出一揽子反应，仍坚持增值电信、寻呼和寿险的外资比例为51%；汽车关税降至25%的时间同意由2005年延长到2006年7月1日，但要求中方在实施期的前几年大幅降低关税；音像方面坚持要求控股和独资；特殊保障条款将在15年内取消；反倾销条款没有取消时间表。

当天，石广生和龙永图即向朱镕基等作了汇报，并研究下一步的谈判对策。

12日上午，国务委员吴仪主持召开了国务院WTO领导小组会议。顺便说一下，她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另一位国务委员王忠禹是副组长，组员是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人。

12日下午，中美举行第四次小范围会谈。石广生代表中方提出一揽子建议，作为对美方11日提交的一揽子建议的回应。中方坚持在增值电信和寿险的外资比例不能达到51%和汽车关税、音像等问题上的立场，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则表现了一些灵活性。

巴舍夫斯基听完石的发言后说：“我感到悲观，中方的建议没有真正体现出中国的政治决策，跟克林顿总统的大胆建议不相符。中方作出一些进展，但在美方最感兴趣的领域没有任何进展。美方最关心的问题如议定书等中方根本没有作出任何让步。我担心目前谈判已经无路可走。”

斯珀林表现得极为恼火，大发雷霆。他说：“我一直在努

力相信你们是有诚意的，想达成协议。但是看了你们对议定书的出价后，我再也不相信了！我以为我们放弃了一般保障条款和纺织品这两个重要的政治上‘赢’（win）的方面是一个大错误，因为这会使你们利用我们的总统，欺负我们的总统。我得出的结论是，你们以为我是一个大傻瓜！”

这位白宫的“大内高参”越来越失去控制：“除非我们在特殊保障条款和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否则我们不可能把协议拿回去！如果我告诉总统，经过3天谈判以后，你们说这两个条款的终止日期是2003年，他肯定会讲，你们马上坐飞机回来！我们绝不可能接受这个！而且你们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也不会得到最惠国待遇！”说着，他不断地拍桌子，“我一直告诉自己，我要保持镇静，但这是一种侮辱！”

石广生怒目圆睁：“告诉你，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强加于我们任何东西！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你没权力说我们欺骗你们的总统！要说欺骗，你们4月份的清单才欺骗了我们！我们是在谈判，应该有商有量，不能只完全满足你们的要求才算是好的出价。至于你们给我们什么，你们随便！我们不强求你们！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讲的是中国领导人的决定！你们的要求必须满足了才能达成协议，中国的事情你们不理解吗？只有百分之百地满足你们，哪有这个道理！你再生气也没用，我们不怕你！”

斯珀林的态度变得更恶劣更无理，石广生说：“最惠国待遇是你们应该给的！一般保障条款和纺织品WTO本来就有规定！你们给了，我们表示赞赏。不要以为给了，就要百分

之百地拿回你们要的东西！中国有自己的根本利益，也希望双赢，我们做了这么多努力，你还发火！中国人怕外国人发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言毕，他“啪”地一拍桌子。

会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几乎令人窒息。美方代表一个个目瞪口呆，而中方代表听完石广生的话都觉得热血沸腾。

巴舍夫斯基开始打圆场了。这位出生于波兰的女律师是中国谈判团的老对手，但她有个特点：喜欢中国的东西。在1996年6月那场著名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她在签署协议时就穿了一件典型的中式对襟上装，被我作为花絮写进新闻述评里。那次临上飞机前，她还不忘在首都机场免税店为女儿买了几件中国工艺品。此次中美WTO谈判，她每天都要换着系上漂亮的中国丝巾。巴舍夫斯基说：“对于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也束手无策。我们将研究中方的建议，并在几个小时之内作出书面反应，反应将是直接和坦率的，然后你我再决定再次见面是否有意义。”

当晚，美方提交了《对结束双边WTO谈判的立场文件》，提出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下，美方同意放弃增值电信和寿险股权51%的要求，在其他问题上特别是音像等方面仍坚持其立场。美方要求中方安排朱总理会见。

13日凌晨，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研究了美方文件和中方对策。

13日上午，朱镕基会见了巴舍夫斯基一行，代表中方对美方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他说：“不管谈得成谈不成，咱们照张相吧。”巴舍夫斯基闻言为之动容。

13日下午，石与巴举行了会谈。美方又提出了一份修改

过的文件，同意放弃增值电信、寿险外方占股 51%，但要求写明外方可以享有管理控制权，录音、录像的分销要求包括出版，允许外资控股。

双方自 13 日晚 21 点进行技术级磋商。14 日凌晨 3 点美方突然中断磋商离开会场，会谈暂停。复会后，美方又以当日上午返回华盛顿威胁中方。14 日上午 9 点休会后，美转交了一封事先打印好的致石广生的信，称谈判已陷入僵局，要求再次见朱总理。

在中方要求下，14 日中午，石与巴又举行了两次会谈。巴表示，克林顿将于北京时间 14 日晚 18 点 30 分离开美国赴欧洲访问，需要在他出访前对外宣布达成协议，要求中方加快谈判进度。石表示，何时达成协议，要看技术级磋商的工作进度而定。晚 17 时 40 分，在双方进行技术级磋商时美方又突然撤离，此后故意不与中方联系。

15 日上午，石再次与巴会谈。巴对技术级工作进度极为不满，认为中方有意拖延时间，并出言不逊。石严辞驳斥，美方态度有所收敛。

当天 11 点 30 分，朱镕基、钱其琛、吴仪等人的专车忽然驶进中美谈判的地点——外经贸部，几位中国高官在 11 层会议室里会见了巴舍夫斯基和斯珀林等。

朱镕基说：“现在我们正在京西宾馆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江主席正在讲话，而我和钱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来到了这里，这个会议本来是由我主持的，江主席正在讲话，可主持人走了。”

巴舍夫斯基说：“我今天感到非常荣幸，看到这么多高层

的领导人来接见我们，真是难能可贵，真想拍张照片放在相框里。”

当时，在寒风中苦等了六天六夜的中外记者都在外经贸部门外等信，而我则幸运地混入现场，在朱镕基等人会谈的房间隔壁静候结果。中午 12 点多，有人进来告诉我：“里面的人都笑了，估计有戏。”不一会儿，朱镕基等从会议室出来，并迅速下楼离去。果然，在这场关键的谈判中，朱镕基坐镇指挥，最终解决了几个最棘手的问题，并确定双方将在下午达成协议。

之后，石广生与巴舍夫斯基加紧展开最后的谈判，双方工作组开始核对文本。这中间，巴曾躲到洗手间给远方的克林顿打电话，请示中美悬而未决的化肥问题，克林顿同意将化肥单独作为一个双边问题来解决。

11 月 15 日 4 点，石广生与巴舍夫斯基签署了两国关于中国加入 WTO 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签毕，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使劲抡了好几下。四周响起热烈而长久的掌声。代表们高举香槟，频频碰杯。石广生、龙永图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几天前还在谈判桌旁咆哮的斯珀林看上去兴奋不已，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石、龙、巴这三位中美出色的谈判家。而巴舍夫斯基则激动地与斯珀林拥抱说：“我真希望我的妈妈在这儿。”签字仪式上被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双赢。

下午 5 点，江泽民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美国代表团。他用了一句古语：“有志者，事竟成。”对双方代表团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和取得的成果深表赞赏。

斯珀林说，一个星期来，他有幸近距离地目睹了世界上

两个最强硬的谈判者的谈判。

江泽民笑着引用《水浒》里的话说：不打不相识。

巴舍夫斯基说，她刚刚给克林顿总统打过电话，总统委托她当面向江泽民主席表示感谢。克林顿认为，正是由于江主席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于中国加入 WTO 的谈判问题，才使得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中美协议的签署，大大加速了中国入世的进程。中国已经一只脚踩进 WTO 的门内。很快，中国与一些国家相继达成协议。

不过，中美之间的较量并未就此完结。

克林顿对国会说：如果不批准中美入世协议，恐怕要后悔 20 年。朱镕基说：不只是后悔 20 年。美国参议院以压倒多数的投票通过给予中国 PNTR。

中国承诺逐步开放市场，而美国承诺解决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无条件最惠国待遇。

2000 年 3 月 16 日，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亚洲 CNBN 记者问朱镕基，如果美国国会拒绝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话，中国将会作出什么反应？中国会否在美国不支持的情况下加入 WTO？而且那样的话，中国会否拒绝让美国商业进入中国市场？

朱镕基答：关于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问题，

这是中美达成协议的一个基础和前提。中美双边协议来之不易，是一个庄严的政府间的协议，我们两国政府都有责任使它获得国会批准而成为法律。中国政府已经尽了努力，在中国的人大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克林顿总统已经承诺，而且确实在努力使美国国会能够通过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克林顿总统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不批准，恐怕要后悔 20 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后悔 20 年，恐怕千百年以后，美国人民翻到这段历史时，也会要后悔，为什么当时犯这个错误，掩卷而长叹兮！因此，我完全相信美国国会议员的明智和理智，一定能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政治家的话总是具有惊人的预见性。当年 5 月 24 日，美国众议院以 237 票赞成、197 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了《授权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该议案提交参议院后，少数人蓄意阻挠，致使表决时间一再拖延。但在多数参议员的支持下，最终于 9 月 19 日，美国参议院以压倒多数的投票通过。

这是中美经贸关系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个事件。

欧美在利益上你死我活。中欧谈判一波三折，欧盟不吃中美谈判的残羹剩饭，北京一次又一次地等待拉米。

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的另一场硬仗是中欧谈判。

欧盟（先前称欧共体）是一个很独特的经济体，以实力

论，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虽然它没法将美国推下世界霸主的宝座。表面上看，欧美是盟友，但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却争得你死我活，毫不相让，在双边、多边贸易中也常常是“既生瑜，何生亮”的血拼。对于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欧盟也绝不甘落于美国之后，要价虽没美国那么高，可也算得上“狮子大开口”。据说，中欧每一轮谈判中，只要中方一提美国，欧盟的代表就火冒三丈：“别跟我们提美国，欧盟就是欧盟，美国不代表欧盟！”甚至有一阵子，欧盟与美国的贸易代表闹到见面不说话。

平心而论，中欧谈判不像中美谈判那般风谲云诡，惊心动魄，但也是一波三折，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择取双方谈判的一头一尾来追述。

1987年6月10日至11日，时任经贸部副部长的李岚清率中国代表团赴布鲁塞尔与欧共体就中国复关问题进行首轮双边正式磋商。

欧方代表团团长是对外关系司司长洛夫。洛对中国派团与欧磋商感到高兴，说他们“尤其注意到贵国政府指派了经贸部第一副部长来与我们进行有关中国在总协定中席位问题的会谈”。

对于谈判中的一些实质问题，欧方表明了立场：恢复问题是一个程序问题，一开始就将恢复问题提到政治原则高度，不太合适，建议先讨论其他条件，把这个问题放到后面解决。

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欧承认中国在某些方面存在发展水平的差距，所以欧给予中国普惠制和官方发展援助，但如果把欧共体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中第六大国。

欧共体“对中国如此庞大、复杂和正在变化之中的经济进行仔细研究之前，还不能够给中国下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狭窄的定义。

关于取消欧共体对华数量限制问题，欧强调欧对华的数量限制与政治无关。其主要原因是：1. 中国贸易体制特殊；2. 中国作价制度不合理。洛夫说：“如果说欧共体有数量限制（占中国向欧共体出口总款的5%），那么中国不透明的进出口计划和垄断同样是数量限制。”欧再次强调：鉴于中国的价格体制改革不可能短期内完成，因此需要议定书中包括选择性的保障条款。

李岚清则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关于“恢复”其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立场，着重解释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说明中国外贸体制的变化和价格体制改革的情况。

从这次磋商的结果看，欧共体在政治上欢迎中国复关，同时从经济利益考虑，又存在着相当多的疑虑和戒心。特别是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意见并不一致。法国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持有异议，欧共体委员会主管中国事务的卡旺和驻日内瓦的GATT代表陈文定则在中国恢复问题上态度挑剔。由于欧共体的复杂性，整体实力逊于美国，要求更多安全保障，成员国利益不同，难以协调立场，可以预见中国在复关过程突然遇到来自欧共体的不小的阻力。

此次磋商倒是解决了一个具体问题，即中国工作组主席的人选由于美欧就此问题僵持不下，工作组无法开展工作。李岚清强调，希望欧共体能从支持中国复关的大局出发，在处理工作组主席问题上给予支持和合作。洛夫表示将把中方的

意见立即报告给欧共体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德克莱克，德是欧共体在中国复关问题上的最高决策人。

正在威尼斯参加七国首脑会议的德克莱克于 11 日赶回布鲁塞尔，并于当晚宴请了中国代表团。席间，他对李岚清说，他已指示欧共体驻日内瓦代表放弃增设副主席的意见，并同意主席由瑞士大使担任。至此，有关中国工作组的程序性问题均获解决。

当时欧方参加谈判的人员中有其对外关系总司中负责关贸总协定事务的司长阿博特，阿以后曾担任欧共体与中国就复关问题进行谈判的首席代表。中国参加这轮磋商的人员有唐玉峰、徐世伟、刘显铭、陈健、李哲生、陈更生和王世春。

2000 年 5 月，中欧拉开了架势进行第 15 轮谈判。

中美达成双边协议后，全世界都把眼光转向中欧谈判。有人预测新任欧盟贸易委员拉米——一位著名的马拉松爱好者，会紧跟巴舍夫斯基来到北京。

然而这种预测并没有应验，事实上是：2000 年 1 月，中国代表团去了布鲁塞尔。1 月 24 日—26 日，中欧在布鲁塞尔举行双边磋商，并取得很大进展。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公告明白地显示：中欧将于 2 月下旬在北京进行磋商，拉米将视谈判的进展情况决定是否到北京与石广生会谈。人们以为，这次拉米终于要来了。可拉米仍然没有来。北京一家媒体写下了这样的标题——《等待拉米》。一个动宾词组，却让人联想起那部著名的荒诞剧——《等待戈多》。

这期间，对在日内瓦进行双边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来说，是丰收的日子，一位又一位贸易部长接踵而至，一份又一份协

议陆续签署。其中，2月22日，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在北京签署协议。石广生与印度工商部长穆拉索里·马兰饮下了香槟。

但拉米何时现身于京城？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欧盟虽然用一个声音说话，但15个成员国的目标各有侧重，法国关心香水，德国关心汽车，意大利关心丝绸。欧盟的谈判代表左右受限，动辄得咎，自是有其苦衷。

中方的分析是：中美达成协议，对欧盟是个不小的刺激，它要在贸易问题上争取和美国同样的地位，要求中欧协议有自己的“特色”，换句话说就是不吃美国的残羹剩饭。

中方的分析是正确的。在中美谈判结果的基础上，欧盟对中国提出新的要价，而且谈判态度也很强硬。

2月21日—24日，中欧在京就WTO问题进行了磋商。谈判的最后一天，欧盟突然提出一份解决谈判中遗留的技术性问题的一揽子建议，称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拉米将不会到北京来。中方对这种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当然不会买账。拉米终于没有成行。

3月，拉米却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北京。29日，朱镕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拉米。朱开玩笑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谈判对手，因为你跟我们的石广生部长一样，谈判把头发都谈光了。”

经过5个回合，双方仍未达成协议。当天双方对外发布的新闻稿充满外交辞令：“双方表示磋商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并富有成果，今后还将继续进行磋商。”

5月11日下午至13日，双方再次在北京开始工作级磋商。

5月15日早7点47分，拉米乘法航抵达北京，当天下午3点会见石广生。

又是几番唇枪舌剑，中方始终坚持原则，死守中美谈判中的底线。同时，在某些产品如陶瓷等关税减让和保险许可证发放数量方面，适当照顾了欧盟的利益，做了一些灵活处理。

5月19日下午6时20分，石广生与拉米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中欧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记者们都说：这下大伙可以歇几天了。7点05分，江泽民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拉米及欧盟代表团，对中欧达成协议表示祝贺。

中欧的这盘和棋，是继中美达成协议后中国入世谈判中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它标志着中国入世谈判已经进入到多边文件的起草阶段。

摠下葫芦又起瓢，多边谈判难以搞掂。在江南水乡周庄的游船上，石广生与佐立克成交了。

对于多边谈判，多数人普遍认为这比双边谈判要简单，只是走个程序而已，美欧都搞掂了，还有什么搞不掂的？社会上一些所谓WTO专家也在不同场合乐观地锁定了中国入世的最后时间表。

世事难料，正是“摠下葫芦又起瓢”，偏偏多边谈判又添麻烦。多边谈判法律性、专业性强，内容十分庞杂。在农业补贴、保险、外贸、分销等问题上，各成员方跟中方代表没完没了地较劲。当然，带头折腾的还是美国。

在多边谈判中，中方始终坚持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原则，力争使谈判的结果不与国内法律的基本原则相违悖，不与国内的社会、政治制度相抵触；务求使中方所作的承诺与世贸组织协议的原则和规定相一致，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的承受能力相一致。

2001年6月，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上海举行。石广生与巴舍夫斯基的继任者佐立克“顺便”谈了农业、保险等遗留问题。石特意选择了江南水乡周庄的一条游船作为会谈地点。他笑着说：“在这样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想吵架都吵不起来！”从游船回到上海浦东，深夜2点，中美终于达成“全面共识”——成交了！

9月17日，WTO总部。日内瓦当地时间下午3点30分至5点20分，WTO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就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法律文件达成了一致，完成了多边谈判。1987年3月4日成立的中国工作组也随之结束了历时14年零6个月的历史使命。中国代表团团长龙永图在发言中说：“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

那么，在多边谈判中，中方承诺了什么呢？

多边谈判主要解决了四类问题。一是中国承诺遵守WTO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包括透明度、国民待遇、统一性等；二是明确我国在WTO相关协议，如农业协议、技术性贸易壁

垒协议等协议中享受发展中国家权利；三是 WTO 成员承诺取消对华歧视性贸易限制和措施；四是我国根据 WTO 要求进一步改革外贸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管理规定。

多边谈判的主要结果是：

一、遵守 WTO 基本规则。

在多边谈判中，中方承诺遵守国民待遇、透明度、统一性等 WTO 基本原则。

首先，国民待遇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各方必须遵守。现在，中国已基本上实现了对进口产品的国民待遇。今后，将对目前仍在实施的有违国民待遇的做法和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如化学品首次进口登记和进口香烟销售中存在的进口产品和国产品待遇不一致的问题等。

其次，世贸组织要求其成员实行统一的贸易政策。1994 年经全国人大通过的《外贸法》已经确立了实行统一的外贸政策的原则，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执行不力。中方承诺在整个中国关税领土内统一实施贸易政策。

最后，透明度是世贸组织的又一基本原则。中方承诺履行世贸组织透明度的规定。实际上我国从 1991 年开始已经逐步做到了对外公布涉及外经贸的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入世，要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确保透明度原则的实施。

二、司法审议。

中方在承诺遵守 WTO 司法审议规定的同时，坚决拒绝了美欧的不合理要求。

世贸组织要求其成员在贸易投资领域为当事人提供上诉、司法审议和复议的机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告

官”。世贸组织成员的企业和个人，在与中方进行经贸合作过程中，对中国有关部门在执行法律法规时所作出的决定或者处理不服，可以到法院上诉。国内《行政诉讼法》对司法审议已经有明确规定，中方承诺在与《行政诉讼法》规定不冲突的情况下，履行有关司法审议的义务。但是，对美欧等西方国家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比如美方要求中外企业和个人可以就中国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本身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超过了《世贸组织协定》的规定，中方予以坚决拒绝。也就是说，中方只能同意“民告官”，不同意“民告法”（包括法规和规章），最终迫使美方放弃了这一要求。

三、外贸经营权。

中方在承诺逐步放开外贸权的同时，保留了必要的管理的权利。

目前中国对企业获得外贸权实行审批制，而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企业在依法注册后，就可以获得进出口权。美国在谈判中要求外国商人和企业不经过任何形式的登记就可以直接经营进出口，这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造成冲击，引起混乱。中方坚持，在外贸权方面，只能承诺国民待遇，而不能接受超国民待遇的要求。经过艰苦的谈判，美国终于被迫承认了中国在进出口管理上的合法权利。谈判的结果是，入世3年后，中国将取消外贸权审批制，所有在华企业经过登记后都可以获得外贸权，但指定经营产品除外。这种外贸权仅指进口和出口的权利，并不包括在国内销售产品的权利，国内销售的权利是通过服务贸易的谈判决定的。

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根据中国外商投资管理的实际情况，中方承诺遵守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取消对外国投资者的外汇平衡要求和当地含量要求。中国曾在《外资法》和《汽车产业政策》等法规中有外汇平衡要求和当地含量要求。由于国内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外汇平衡要求已失去实际意义。当地含量的要求对国内产业发展曾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取消政府强制规定，改用经济手段和其他手段，其作用可能会更大。据此，中方将在入世后取消这些强制性的要求。目前，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已不再强制规定出口实绩要求和技术转让要求。中国有些法规虽有这些规定，但实际上由于难以监督和检查，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入世后，中方承诺出口实绩和技术转让由投资的企业双方通过谈判议定。

五、过渡性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条款。

经过谈判，美国最终同意经过一个过渡期，取消针对中国的带有歧视性的特殊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条款。

世贸组织协议中有关于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条款的规定。长期以来，美欧通过其国内立法，对华实施“特殊保障条款”和“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条款”，这与世贸组织普遍适用的规定不一致。在谈判过程中，美欧借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提出建立所谓“毕业制”，即由他们来判定中国哪些部门、哪些企业，在什么时候可以适用世贸组织规则，实质是企图将美欧目前的做法永久化。中方与美欧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达

成“日落条款”，即在一个明确的时间内，美欧取消这些做法，过渡期结束后，必须适用世贸组织规则的正常条款。在中美达成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中，美方被迫同意对“特殊保障条款”和“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条款”分别提出 12 年和 15 年的取消时间表。

六、国营贸易（即进口专营）。

经过谈判，中方对一些重要产品保留了进口专营的体制。

世贸组织允许通过谈判保留或者取消享受垄断权的进口指定经营。为使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保留对进口的合法调控手段，中方在谈判中要求对重要商品的进口继续实行指定经营管理。通过艰苦谈判，中方保留了原油、成品油、化肥、粮食、棉花、食糖、植物油和烟草 8 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产品的指定经营管理（即由政府指定的少数公司专营）。同时，参照国内目前实际进口情况，对非指定经营（非指定经营指加工贸易等非一般贸易方式的进口不需要由指定公司经营）的比例作了规定。

七、取消了其他成员对中国产品的贸易限制。

经过谈判，所有对中国维持贸易限制的世贸组织成员，都承诺取消贸易限制。

欧盟、土耳其、泰国、墨西哥、挪威等世贸组织成员承诺，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所采取的不符合世贸组织协议的禁止进口或数量限制措施，全部按时间表逐步取消。欧盟同意，在 2005 年以前，全部取消保持了多年的对我国鞋类、陶瓷餐具等产品的数量限制，在过渡期内还要增加中国产品的配额量。

八、农产品国内支持。

经过谈判，中国获得 8.5% 的农业国内支持水平，为今后我国农业扶持政策预留了空间。

世贸组织规定，成员方对农业提供的补贴，主要指价格补贴（被称做“黄箱”补贴），超过了一定限度就要承担削减义务。这个限度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占其农业国内生产总值或某一特定农产品生产总值的 5%，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则是 10%。美国提出，中国的补贴允许量不得超过 5%，即要求中国采取发达国家的标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 1996—1998 年间“黄箱”补贴量年均只有 35 亿美元，不到 3%。但在谈判中，中方要求享受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围绕这一分歧，中美进行了艰苦谈判。中方据理力争，直到今年 6 月，美方最终同意中方补贴允许水平为 8.5%，并已在多边谈判中为各方所接受。这一结果，较好地体现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维护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使政府在扶持农业发展方面具有较大的政策空间。

为什么没能在 WTO 取代 GATT 之前加入？发达国家漫天开价，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难缠。龙永图说：“我们对个别缔约方表示不满，对多边体制的前景表示担忧！”吴仪亲自到机场迎候复关未果的中国代表团。

我从多哈采访归来后，许多朋友和同事问我：为什么中国没能在 1995 年 1 月 WTO 取代 GATT 之前进入这个组

织？要是那样，我们不就可以少交更多的学费吗？

事物从来就不会尽如人愿地直线式发展。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 WTO 各成员中引起了普遍的疑虑和担忧。发达国家自不待言，流行“中国威胁论”，怕经济上站起来中共也在政治上让“红色”渗入全球，因此步步设防，处处作梗，谈判中漫天开价，有时搅得天昏地暗。如美国，第一个目标是通过市场准入谈判，最大程度地打开中国的市场。第二个目标则想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条件，限制中国发展，防止中国成为其竞争对手，并引导中国走上美国所希望的私有制道路。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紧盯不放：中国加入 WTO 后会不会冲击它们的市场？2001 年墨西哥代表在出席 APEC 部长级会议时，惊叹于上海滩的变化：“我们下榻在浦东 88 层的金茂大厦饭店，在我们国家最高的建筑是 53 层，而金茂大厦的饭店的大堂是在 53 层。”像印度、墨西哥等本是 WTO 发展中成员的“大哥大”，它们不愿见到中国加入后动摇进而取代它们的地位。欧盟驻日内瓦大使陈文定警告过中国，发展中国家难缠，事实证明，中方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谈判也是非常艰苦。

这也难怪，谁让 13 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是块肥肉呢？

1993 年乌拉圭回合的结束，无疑增加了中国复关的紧迫性，假使中国不能在 1994 年底以前完成谈判，新的组织——WTO 就将诞生，中国无“关”可“复”了。因此，努力在 1994 年底完成谈判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目标。

1994 年 1 月国务院总理李鹏第二次致函各缔约方首脑，

敦促他们在谈判中采取更加积极和灵活的态度，60多个国家的首脑回信或作出反应，明确支持中国尽早复关，使得在2月份召开的GATT第16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出现了推动谈判进程的势头。然而，少数西方国家的消极态度仍是谈判的拦路虎。

美国代表在会上说，“对结束谈判的时间不应做投机性的猜测”，“应当顺其自然”。

1994年4月乌拉圭回合协议签字。作为GATT的全面参加方，中国理所当然应该成为WTO的创始成员，11月，中国告诉世界，如果谈判不能在1994年底完成，中国将不会再主动要求谈判。

成败在此一搏。11月28日，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共31人奔赴日内瓦。

12月15日起，连续开会，连周末议程也排得满满。午夜的关贸总协定大楼里，灯火通明。这种情景只有在乌拉圭回合最紧张的时候才出现过。

裂罅终于难以弥合。

有的缔约方谈判代表动不动就向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举牌子：“我们这个问题还没得到满意答复！”就是说“这个问题”你通不过。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龙永图舌战群国。吉拉德不得时常提请大家“休息片刻”以舒缓气氛。谈到最后双方都忘记了是代表国家在谈，个人都进入了角色吵红了眼。

12月20日，中国最大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以近半版的篇幅刊登了记者述评《千帆尽举待东风——中国复关备忘

录》。文中引用了龙永图的演讲辞：“中国复关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太平洋彼岸某大国的政治诚意。”述评还引用了吴仪的话：“假如中国不能如愿以偿，我们将按自己的规则踢球。”

就在这一天，由于美国等无理阻挠，要价离谱，双方谈崩，中国复关未果。

赶到日内瓦的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在当天的中国工作组第19次正式会议上声明：“中国并不想关闭谈判的大门，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GATT中规定的义务。我们将把我们能够接受的议定书案文和修改后的市场准入的3个减让表提交工作组，供缔约方作出选择。”

但美国等个别缔约方根本不想在这个时候选择了。

下午，吉拉德作了总结：“经过中国和各缔约方的共同努力，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由于谈判的全部工作尚未结束，我将于明年早些时候继续召开中国工作组会议，届时希望各方显示最大的灵活性，以尽早结束谈判，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龙永图说：“非常抱歉，主席先生，届时我们还不能做好准备。”

良久，欧盟的代表举了一下牌子：“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中国代表团谈了很多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我们认为还要进一步工作，我们愿意继续与中国代表团合作。”

美国代表只进出了干巴巴的几个字：“要继续工作。”

另一些国家的代表则表达了对中国的同情和对此次谈判结果的失望。

龙永图发言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留学背景使他的英文总是那么地道：“首先感谢各代表团和我们一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感谢大家付出的辛苦。中国一直在努力工作，跟大多数缔约方都进行了诚挚的磋商，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个别缔约方，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诚意解决问题。中国代表团非常失望。难道今天的关贸总协定、明天的世贸组织，就由个别缔约方主宰多边的进程？我们对个别缔约方表示不满，对多边体制的前景表示担忧！”

会场一片沉寂。

会议结束后，吉拉德以及许多国家的代表都走到中国代表团的席位前，与谷永江、龙永图等热烈地握手和拥抱。

欧盟的代表也过来与中国的两位团长握了握手。

但是，美国代表没有过来。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了一条消息，标题是《我国复关未达成协议》。

当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回程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团员们从机舱里看到，停机坪上站着一大排前来迎接他们的人，其中有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女部长吴仪。按照礼仪惯例，只有下级迎送上级，可这次，善解人意的吴仪顶着北方冬日的刺骨寒风，手捧一大束鲜花，亲自迎候她的将士们归来，一如迎候远方凯旋的英雄。许多团员的眼睛湿润了。

对于代表团成员来说，最宝贵的是来自全社会的慰藉。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鼓励的信件源源寄来。鞍山钢铁厂的一位工人给中国代表团寄来一封信，信中夹了100元钱，说是让他们在谈判间隙时买点咖啡提神。

克林顿访华之行的惟一成果是产生了一条旅游新线——总统之旅。中国再也不是孤军奋战。“不按牌理出牌”的墨西哥在最后一刻与中方言和。

复关谈判冲刺失利后，谈判再度陷入低潮。

经过半年的冷却，双方又在试探水深。毕竟，WTO 已经存在，WTO 谈判是一个无法替代也无法回避的谈判。1995 年，中国正式申请入世。

“试水”的结果是深不可测。原因还在美国。在新成立的 WTO 中，美国依然霸道。作为记者我没有参加过谈判，但对美国的蛮不讲理和目中无人早有所闻。2001 年 11 月 10 日，当 WTO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入世决定后，各成员代表要向中国表示祝贺，并按报名顺序上台。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是最后一个报名的，却非要“加塞”第一个发言，会议主席只好让他第一个上台。美国的做派由此可见一斑。

克林顿第二次连任后，在中美问题上，选择了贸易作为他树立政绩的突破口，美国第四次更换与中国谈判的代表，经验丰富的巴舍夫斯基亮相，谈判一度出现转机。但谈判的势头很快又被甚嚣尘上的反华浪潮所吞噬。

中美入世谈判犹如在布满暗礁的险流中行进的一条船，但障碍并非只有一个，知识产权谈判、双边市场准入谈判、纺织品谈判盘根错节，贸易战几次一触即发。巴舍夫斯基向她的对手吴仪承认：“双方应通过协商，而不是通过不适当的压

力或激烈的行动来处理问题。”可惜，美国的谈判立场总是摇摆不定，当美国代表无法找到平衡点时，他们的招数就是——拖而不发。更重要的是，这场谈判不可能不受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1995年6月，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赴美进行“私人访问”，中美关系降到冰点，中国入世谈判也转入低调。

1997—1998年，中美实现首脑互访，机遇之窗再次打开，但双方还是失之交臂。

江泽民访美期间，双方对外宣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在《中美联合声明》当中，美国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早日加入WTO符合美国的利益，双方同意加紧谈判。

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6月26日晚，从西安抵达北京的车队驶过寂静的长安街。在这串长长的车队中，却缺少总统的一个重要随同人员巴舍夫斯基的座车。此时，这位身材纤瘦、风格犀利的女代表已经坐在外经贸部的谈判间里，与石广生、龙永图谈判。

可是，虽然借得了首脑访问的东风，通宵达旦的谈判还是没有取得成功。或许对克林顿而言，什么都不答应，什么都不做，他回国才可以向反华议员们交代。他这次中国之行的惟一印痕，是让中国旅游部门从此开发了一条旅游新线路——“总统之旅”。

但外围还是在逐个扫清。1987年8月6日，中国与新西兰经过紧张谈判签署了双边协议，新西兰贸易部长为此放弃了参观长城的计划。新西兰是第一个与中方达成协议的西方国家。

中新告捷，趁热打铁，代表团一鼓作气，随即在汉城与韩国签署协议。

1997年9月，不愿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内阁力排众议，促使中日结束了货物贸易的谈判。

中国与越来越多的WTO成员携起手来，再也不是当初的孤军奋战了。

然后，就是如前面所述的拿下了中美和中欧两场谈判。

墨西哥是最后一个同中国达成双边协议的国家。本来，众人都觉得在多边谈判完成之前，中墨不会达成协议了，只能是“互不适用”。因为墨西哥基本上“不按牌理出牌”。双方的主要分歧是：墨西哥对中国几百种商品实行贸易限制，征收100%甚至1000%的“反倾销”税，而这些所谓的“反倾销”措施完全不符合WTO规则。中方要求它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必须取消。墨方最初要求有一个15年的过渡期，而中方要求过渡期必须在5年内结束。因此，谈判一度僵持不下。直到墨西哥新总统上台后，在双方领导人的直接推动下，2001年7月27日，墨贸易部长德贝斯访华时与中方内部达成了协议，墨同意过渡期为6年。但考虑到墨国内产业的压力，墨方要求等到中国加入WTO所有谈判结束前夕再正式签署协议并对外宣布，中方同意了。这样，2001年9月13日，中墨在日内瓦签署双边协议，至此，中国结束了入世的所有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谜底总要揭开，在双边谈判中，中国承诺了什么呢？

双边谈判主要解决关税逐步降低，进口限制逐步取消，服务贸易逐步开放这三个问题。双边谈判的关键是能否以发展

中国家身份加入。根据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发展中国家在一些方面可以享受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差别和优惠待遇，特别是过渡期。例如，就信息技术产品而言，发达国家需在 2000 年将关税降为零，而发展中国家则可延长至 2005 年。关于整体关税水平，发展中国家目前平均为 14%，到 2005 年大约降到 10%；发达国家目前平均税率 4% 左右，今后还要进一步降低。如果中方放弃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就得在加入时把关税降到 4% 左右的发达国家水平。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和差别待遇对于减缓市场开放的压力，赢得调整和发展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中国必须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

中方在谈判中为获得发展中国家的权利是经过艰苦抗争的。美国开始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后也不得不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问题”。就是同意通过谈判，中国在实施义务方面可以享受一定的过渡期。中方最终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就我国入世后若干年市场开放的领域、时间和程度等达成了协议。到 2005 年，将中国关税总水平降为 10% 左右，逐步开放电信、金融、分销等服务贸易领域。

经过努力，世贸组织成员特别是美国在谈判中满足了中方一些最根本的要求。美国承诺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放弃一般保障条款（即在中国入世后美随时可与中方中断世贸组织关系的条款），同意对放宽高技术出口限制作出适当表示（但不同意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挂钩），放弃要求继续对中国纺织品实行 10 年的配额管理，承诺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前取消，同意对“特殊保障条款”和“非市

场经济反倾销条款”提出取消时间表。

中方在双边谈判中坚守的底线主要包括：

在证券方面，坚持不开放 A 股交易（即不开放资本市场）；

在寿险方面，坚持外资股比不超过 50%，不承诺外资拥有管理控制权；

在增值电信和寻呼方面，坚持外资股比不超过 50%，不承诺外资拥有管理控制权；

在电信服务关口局方面，坚持所有国际电信业务必须经过中国电信管理部门（作为独立监管机构）批准设立的关口局；

在音像服务方面，由于这不是一般产品，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中方录音和录像的开放不包括出版和制作，坚持电影院不允许外资控股，坚持音像领域只允许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设立中外合作企业，同时音像制品的输入和分销必须按中国法律法规进行审查，以确保中方对意识形态领域和对文化市场的管理。

同时，中方也在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作了一些让步，包括：对大豆，同意实行 3% 的单一关税（原方案为争取保留关税配额管理）；对豆油，同意 2006 年取消关税配额管理（原方案为争取 2006 年后继续保留关税配额管理）；对五大塑料的关税，同意 2008 年降至 6.5%（原方案为 2005 年降至 10%，以后不承诺进一步减让）；对汽车及其零部件关税，汽车关税 2006 年 7 月 1 日降至 25%，零部件关税 2006 年 7 月 1 日降至 10%（原方案为汽车关税 2008 年降至 25%，零部件

关税 2008 年降至 10%)；对增值电信和寻呼，同意在加入后 2 年允许外资比例达到 50% (原方案为只同意 49%)；对外资银行的国民待遇，同意除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外，不作限制 (原方案为不作承诺)；对因特网和卫星服务，同意按增值电信和基础电信分别承诺因特网和卫星服务 (原方案为不作承诺)；对电影，承诺加入后每年允许进口 20 部分账电影 (原方案为不作承诺)。总体来看，双边谈判中方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权利和义务是平衡的。

代表们让我写事不写人。张向晨被认为“卖国”又“卖身”。龙永图的航空里程奖励积分足以飞往月球，他说：“我最可以自慰的是入世谈判没有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半途而废。”

在写这部文稿前，一些人曾提议我，写一写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的所有参加者。当我把这个意思转述给龙永图和其他谈判代表时，得到的答复一律是：写事可以，不要写人。

我并不想为谁评功摆好，树碑立传，但确实对这些曾为谈判呕心沥血、牺牲自我的人们充满了敬慕，正是他们坚决捍卫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才使这场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和锲而不舍，才使这场谈判的结果显得格外来之不易。

15 年谈判，几代人为之奋斗，有的业已作古，有的两鬓染霜，壮志未酬寻常事，风烟踏尽自从容。中国代表团几经

更替，薪火相延，一串长长的名单后面，是一份沉甸甸的记忆，是一个个鲜活感人的故事。中国谈判代表的人格、意志和能力，赢得了几乎所有谈判对手的尊重和折服。面对不同对手，他们寸“利”必争；面对某些非议，他们默默忍受；面对谈判久拖不决的压力，他们从不放弃任何一点努力；面对谈判结束后来自各方的赞誉，功不可没的他们报之以平常心……多年来，我有幸成为谈判进程的旁观者和记录者，与众多谈判人员相识相知，并得以近距离地感受他们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情怀。我发觉自己的笔力已不足以描述他们所饱尝的甘苦炎凉。

1999年11月16日，在中美谈判中连续作战六天六夜没回家的外经贸部谈判人员却被国内一些产业骂成“李鸿章”，国际贸易谈判中正常的让步被扣上“割地赔款”的帽子，对此，他们付之一笑。那天，国际司处长张向晨（2001年11月11日中国签署入世议定书时张是助签官）一边收拾办公室里搭了几天的行军床一边嘻嘻哈哈地对我讲，别人传说他卖国，他太太戏说他卖身，为了谈判连家都不要了。2001年一个夏日，我在已升任副司长的张向晨办公桌上瞥见了中国代表团前秘书长李仲周1997年赠张的一首言志之作《寄语青年伙伴》：

安外朱楼菁满堂，五旬自比少年郎。
寒月挑灯同伏案，几回抱卷接朝阳。
两代无间同手足，一腔热血共参商。
可恨时光留不住，镜前顿觉鬓秋霜。

磨难莱蒙终不悔，感时当在国荣昌。

中国代表团最后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任团长龙永图笑言，他为复关和入世谈判去 WTO 总部不下 50 次，得益于航空公司的里程奖励计划，他从航空公司拿到的免费机票足以飞往月球。2001 年 11 月 8 日上午，在多哈喜来登饭店龙永图房间，面对窗外的灿烂阳光和美丽海滩，我问这位似乎生来就是为贸易谈判准备的风云人物：“您个人觉得您对中国入世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龙说：“贡献谈不上，我想我最可以自慰的是入世谈判没有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半途而废。”

2001 年 11 月 10 日掀开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崭新一页，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 WTO 的一员。有人说，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里程碑；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个敢于向全球开放自己的国家，永远不会沦为世界经济的孤岛。在竞争中发展，在风浪中搏击，是发展中成员实现经济腾飞、后来居上的必由之途。不管 WTO 是“芝麻开门”的福音也好，还是潘多拉魔盒的咒语也罢，中国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入世，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找到更有利的位置，拥有更重要的发言权，获取更快速更健康的发展。或许，十年、百年之后，我们对这场谈判的深远意义会有更透彻的领悟，对坚持和推动这场谈判的人们会产生更由衷的敬意。

让莱蒙湖作证。让历史铭记。